

11月1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工委和政协网络联合举办的教育之春沙龙上，在分享了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呈现的一堂科学课的视频和教师们的探索体验后，教育和脑科学专家应邀分享了自己的发现和建议。

——编者

一场关注课堂教学变革的集体赏析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

没有“好关系”就没有“好教育”

美好的教育实践和正确的教育理念、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合作对话”的关键，我理解就是“关系”的建设，“关系”是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一直说没有“好关系”就没有“好教育”，有了“好关系”才有“好教育”。“合作对话”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建立良好关系，尤其是良好的师生关系。

当然这种合作远远不限于师生关系，对话也不限于师生之间的对话，涉及到多种对话，包括学生和文本的对话，包括家校合作之间的对话、师生关系的对话、生生关系的对话等。

我一直认为“生生关系”同样重要。有研究发现，在青春期，尤其是在初中这个阶段，伙伴关系是决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存在感、幸福感的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整个的学习理论也在从传统的课堂教学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钟祖荣：

要关注差异化教学与个别化指导

北京市朝阳区开展的学校文化建设经过了三个阶段，从学校文化到教育文化，再到理想的教育文化，不断地升级，体现了实践者不断反思、不断改进的态度，值得学习。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对培养目标讲的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第一位强调的是“有理想”。理想是一个人成长的目标，是方向，是驱动力，有了目标、方向、驱动力，学生的发展就有了方向。即便是他有点学业负担，也不会觉得有负担感，这是根本。现在很多学生跟过去不一样，物质条件好了，往往动力不足，缺乏价值感，我觉得就是因为忽视了理想教育。强调理想的教育，才是抓住了教育的根本。

“合作对话”这种教育教学模式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把学生放在学习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体现了建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陶沙：

希望脑科学研究贡献于基础教育改革

“理想教育文化”课题呈现给我的核心词是“合作、生长和共同体”，把学科知识传递的课堂转变成大教育，通过课堂内外变革、学科教育结合大主题跨学科的变革、学校管理的变革、家校合作的变革，支持学生生长、教师和家长成长。

在通过行政力量在量上减负之后，课题通过“合作、生长和共同体”将提质和增效落到实处，超越了课堂和单个教育活动，课题从文化角度提出和检验解决方案。教育要塑造优秀的国民，而优秀的国民还需要优秀的大脑支撑，以完成无限且未知的社会责任。因此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怎么从孩子脑的结构和功能更优发展的角度来推进、拓展、辐射。

以下问题希望有机会共同探讨。第一，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和不同教育进程如何针对性地实现有效的合作和对话，形式、策略如何进一步优化？第二，高质量的“合作、对话”一定会引发认知的冲突，而每个学习者、参与者自己的认知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

协力创建美好教育

任何教育政策的变革，都涉及到学校的变化和课堂的变革。

第一，我理解的“美好的教育”有三个关键词：教育本身要实实在在的好，也就是客观做得要好；教育所有参与主体的主观感受要好；要能够给社会政治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支撑，也就是说，社会感觉要好。美好教育一定是个大家都参与的教育，合作对话、合作学习本身就反映了美好的应有之义，要有参与。

第二，“双减”和我们以前提到的减负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一个政策文件里面搞了两只手，一只手抓学校教育提质增效，一只手抓校外教育规范发展，这是中国的一个独创。国家层面其实也还关注了另外一只手，就是家庭的手，其实减负要真正地做好需要有三只手，202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少了任何一只手，减负的可持续性就有问题。美好教育和合作学习中，通过减负这

转向以项目研究为主体的新的角度。马斯克办的学校没有课堂教学，完全就是项目学习，在项目学习的基础上“生生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同学们要围绕一个主题开展探索。

在家校合作的关系上，怎么提升父母、家长的教育素养是教育发展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远远不如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到学校来之前行为特征、认知风格、行为习惯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即使上学以后他大部分的生活空间还是在家庭。所以在家庭里面怎么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其实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关注的，而且必须要努力促进，使之更好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再好的学校教育也无济于事。我注意到，在“理想教育文化”里面，也已经关注到了理想家庭文化的建设，今后对这一块的研究和推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构主义的思想，通过大家的讨论分享来建构知识的意义。只有通过自主建构、合作建构，学生的学习才能真正发生，才能真正理解知识、理解意义，也才能够达到深度学习的学习效果。才不会因为死记硬背、简单重复而产生学习的负担。课题也体现了治理理念，即共建共治共享，对话就可以协商，协商就能够符合各方面的实际和意见。总之，“合作对话”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学校老师通过课堂教学，通过家校合作，通过很多具体的途径来落实这样一个思想，已经必将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建议把合作对话引向深入，引向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因为“合作对话”把学生当作主体，但是这个主体不是一个模子，学生是有差异的，调动学生时要考虑这些差异，要重视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重视学生的多元智能，设计和运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把差异化的教学和个别化指导真正落地落实。

型，在学科和跨学科关键主题框架下和人类基于证据的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的冲突，如何发现、有意地引发冲突，然后促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实现教育者所追求的生长？第三，精心的教育教学设计意味着巨大的教学工作量，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学生优质成长和教师的幸福工作如何协同？第四，跨学科主题的提炼。不是所有的点和技能都值得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跨学科的主题设计，跨学科主题的凝练需要一个主题激发，从而带动四面开花的局面。那么，哪些核心主题可以提炼出来，从而起到一个中心带动四面开花的作用？第五，怎么破解提质和增效的共性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延续下线上教育的问题？最后，特别希望课题能够进一步凝练成果、不断积淀，从而成为学校、学区的宝贵财富，并辐射传播，为全国乃至全球教育变革作出独特贡献。特别期待儿童学习和脑发育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基础教育改革实践者持续交流，共同探索，不断创新。

个小切口，营造的是一个大格局，即学校教育主阵地、校外教育辅助地、家庭教育支撑地。

第三，关键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现在我们有三个热词：核心素养、关键能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即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基于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国家政策，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均提到学科的核心素养。中小学教育改革要融合关键能力与基于各门学科的学科素养。

第四，中小学教师成长、学生进步、学校发展需要同步，学生减负的主客观认识和感受也要统合在一起，美好教育要体现在教学管理、内容与组织方式上。教师的能力要提升，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政策素养；同时也要有融合教育、家庭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基本素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

美好的教育愿景需要落地

关于教育，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美好的愿景，但是具体怎么实现？而我们北京市朝阳区在全区持续十几年对教育文化探索认识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以来“理想教育文化”课题的扎实实践，给了我们同行许多业务上的示范。

在教育教学一线的老师，通过“合作对话”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索，让美好的教育追求落地，这样的探索本身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已经给学生带来实际的收益，让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业化水准获得了很好的提升。

当然，人类学习知识的方式有很多种，学习不同的知识选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是最聪明的选择。在教与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的情况，我们的工具箱越丰富，我们的收获也就越大。

我个人觉得课堂上发生的变化一定始自教师之变，一定要依托于学生的“有组织”，只有把教师的“有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

我们需要更多指向课堂优化的探索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身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每当看到实践这只大脚扎实地踩在了课堂上，就会为之震动，为之欢悦。今天“理想教育文化”课题带来的感觉就是如此，令人兴奋。古今中外，再好的教育概念或理论停留在嘴上、躺在考卷或文章上，都不会带来生生不息的教育活力。

这些年教育行业其实有两个尺度在衡量，一个是分数是升学率，这个尺子太大了；第二个尺子就是文章的发发表量，实践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不例外。大家都在诟病这两把尺子。很多教育人也期盼在纷繁复杂的“教育实践”中寻找一把合适的尺子。今天沙龙呈现的教学现场告诉我们，这把尺子应该是“课堂教学的实验和实践”。

教育本质上是把人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积累起来的抽象符号系统，也就是所谓知识积累，用10年、15年传递给社会的新生代，这个任务应

“合作对话”是教育教学发生的基本规律

王世元

“合作对话”式教育，是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学习资料、学生与仪器、学生与环境、学生与自身等建立在“合作”基础上形成的“成长共同体”，采取“对话”的方式，就某个（类）问题进行探讨或省内，以此建立共同体成员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也包括对学习资料、环境修订与改造等。

显然，“合作对话”是一个“成长共同体”，它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资料（包括仪器环境等）要素构成。“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合作”目标，指向受教育者的成长。教育者可能是教师、学生，也可能是学习资料、学习环境，还有可能是自己。

由此，教育者不一定是人们认为的教师，也可能是“物”“某事件”或受教育者自身。一旦是“物”或“某事件”，转变为教育者的角色；或者说，学习资料充当了教育者的角色，“教育者”和“学习资料”两个要素就“合二为一”。当教育者为受教育者自身时，就是受教育者自身的反思、内省。

由此不难发现，教育者、教育资料两个要素的确立，取决于受教育者。进一步说，受教育者可以决定谁是教育者，谁是学习资料，并处在能动的核心位置。只有受教育者不断地应用已有的知识工具与教育者、教育资料对话，才能实现自身的成长，即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建构。否则，任何外在的力量，无论提供多么丰富有趣的学习资料，充足的学习时间，

变”和学生的“有组织”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课堂生态。但是真正要实现这一步，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建立相关的学习小组，包括操练以及在学生当中形成相应的共同交流合作的习惯。第二，教师在这个任务派送当中，结合教材、结合学生，结合新课标当中提到的单元学习、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等，分时间段分单元把相关的任务或是日常的常规性的任务，或是有创新性的任务，或是重点的任务，以不同的形式派送给学生，如果学生在课下能够有所交流，如果在课上师生能有所交流，可能带来的变化会更大一点。第三，教师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意志和实践。所谓任务派送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在课上课下以问题为中心的总体设计。我想有了这三步，最后才能够实现教师的“有改变”和学生“有组织”的样态，才能让我们的课堂真的发生改变。

当说相当繁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感性的花花世界里，要超越感性掌握各学科的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主阵地是课堂教学。这一代孩子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在有限的教育时段里掌握我们必须的文明文化传承？又有多少教师能够胜任呢？这是教育研究和实践最根本的问题。

在“理想教育文化”课题实践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师生之间教学演示、孩子们之间的活动、教师们之间的相互磋商都带着他们朝向最精致、最好、最有效、最适宜的教育模块、教育模式的打造，这种基于概念、重点或难点课的“打磨”，不再是为了表演或上级观摩，而是创造最好的课堂教学“基础模式”和它的变式，以适应更多的儿童和更多的教师。我认为如果一个好老师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孩子们，这就是他最大的功勋。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指向课堂优化的行动式研究和在相关理念指导下的探索。

只要没有受教育者参与的“对话”，真实的教育都不会发生。

传统教学，或现代教学，由于缺少建立“合作成长共同体”的意识，没有明晰教育发生的基本规律——“合作对话”，更由于传统的师生关系文化，受教育者习惯于在教育者“压迫”下被动地“对话”。当然，尽管如此，教育依然能够发生。因为不论受教育者主动对话，还是被动对话，只要对话真正发生，哪怕受教育者极不情愿地对话，教育也能发生，只是教育发生的深度、广度不同。

由于不同教师和学生构成不同程度的“成长共同体”，则有不同程度的教育发生。优秀教师除与学生构成较好的成长共同体外，还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料，并能较好地唤醒学生积极主动地与教师、学生、资料对话。

依此考察：“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项目学习”“先学后教”“导学案”等模式，其本质上，也是追求受教育者与他人、与资料主动对话。这种对话，由教育者施加外力，让受教育者被动完成，从而实现受教育者由外而内知识、能力与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建构。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完全建立在“成长共同体”基础上，通过“对话”，唤醒受教育者强烈的对话愿望，主动与教师、学生、资料和自身对话，实现受教育者由内而外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建构。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合作对话”存在于所有教育教学范式中，只要教育发生就有“合作对话”。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工委副书记，“理想教育文化”课题负责人）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性工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对于涉及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西部地区而言，尤为重要。

近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扶贫成效显著、教师队伍短板正在补齐、财政投入加大倾斜等，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普遍性问题，比如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学生作业负担过重、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等。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双减”意见明确指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通过“双减”政策来突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困境，进而构建良好的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有调查显示：西部地区某省实施“双减”政策以来，学生的作业负担和超过七成的校外培训负担得到大幅度减轻，学生对学校课后服务的满意度达到九成以上，学生课余时间和睡眠时间都得到增长，但也存在农村中小学作业减负效果欠佳、学生完成作业时间达标率较低、课后服务类型缺乏多样化、学生周末电子游戏时间增加、学生作业内容和布置形式单一等现象。可见，“双减”政策的实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有效地遏制了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内卷现象，但要实现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目标，以及建设西部地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还需要从根本上去优化生态系统。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优化，首先要厘清国家整体视域中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并总结出需要保留和持续的有益经验。从历史来看，我国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生态主体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的视域融合，从基于社会本位和强调基础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聚焦到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生态类型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共治的转换，从治理的视角切入，有效激发治理主体的活力；三是生态区域从优先发展到教育公平转换，从关注重点学校发展到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强调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基石的意义和价值；四是生态层次从位阶分明到精准跨越，即不断改革基础教育评价的机制，弱化应试的筛选功能，强化素质教育的育人价值。这四方面经验，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同时，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优化，还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现师生和家长等其他生态主体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和谐共生；二是遵循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原则，在教育目标的设计、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活动的组织、教育方法的变革和教育评价的优化等方面，都要遵循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注重德智体美劳等五育的融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三是通过有效的政策扶持和资源配置，建构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从而更为有效地推进基础教育的公平发展；四是要充分汲取西部地区的优质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到西部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特点，将本土优质文化资源融入基础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从而更为有效地培养热爱西部、扎根西部、建设西部、发展西部的栋梁之材。

“双减”政策背景下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优化，事关千家万户的教育福祉，也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尽快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开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局面。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部部长）



天津：劳动课上学技能

11月17日，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的学生在上木工课。近年来，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积极开展劳动实践教育，学校通过分年级开设手工艺、农事劳作等劳动课程，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借力「双减」，推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生态的系统优化

孙杰远